

数目字管理: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会计制度的形成*

郭志炜

内容提要: 中国革命从政策到实践的过程中,技术性手段不可或缺,这对理解革命的意义和历史的复杂性有重大作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从个体经营转向集体经营,中国共产党利用数目字的管理将二者连接在一起,合作社的会计制度由此诞生。为了让运动顺利推进,政府通过编制教材和组织培训班的方式解决会计人才缺乏的问题。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会计制度中的账簿体系、记账方法、财务管理三方面内容不断改进,使得制度更加规范,为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注入动力。会计工作的特殊属性,使其对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对农民的生活和文化教育,对农业知识和农业科技的推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数目字管理 农业合作化 会计制度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长期存有自发的互助组织。从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民间的互助形式为基础推行农业合作运动,将农业生产的组织程度逐渐提高,相继成立了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些新形式的互助组织与传统的互助形式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生产的组织性和财务的数目字管理。^①生产的组织性学界已有众多研究,^②而财务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长期被忽视,常常是作为前者的附属内容。以往的研究关注点是运动如何展开,聚焦于中央和上层、政策和效果,偏向于政治。合作化运动既具政治性,也有经济性,会计制度则是将农民融入合作组织的重要技术手段。目前对经济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工分制和生产效率,而对会计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③涂玲对人民公社时期华北农村使用的各种凭证、账簿进行了分类和介绍,并分析了村庄财务的

【作者简介】 郭志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9,邮箱:415093075@qq.com。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

① “数目字管理”一词可追溯至黄仁宇对明朝财政史的研究,引发了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财政管理和治理能力的思考。中共的领导和治理技术也有“数目字”的特点。参见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王志峰《数目字、民主与动员:从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苏区研究》2020年第3期。这一特点在当前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中依然广泛存在。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特指农村地区的会计和财务管理制度。一方面它涉及的内容和数目字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也属于更大范围的数目字统治技术的一部分。

②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黄英伟《20世纪70年代农户收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③ 目前学术界对会计制度的研究,大多是在资料介绍类论文中分析账簿史料的学术价值。参见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张思《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张俊峰《文本的历史:集体化时代山西社队文书档案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王静、刘美文《集体经济时期的村庄档案资料库》,《湖北档案》2015年第3期;孙建刚、史红霞《集体化时代后期一个城郊蔬菜专业生产村的生存实态——原峰峰矿区临水人民公社东沟大队第3生产队档案资料综述》,《邯郸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此外,在史学方法类论文中对账簿的利用进行思考。参见胡英泽《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重于资料运用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行龙《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张瑜、张俊峰《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考证问题——基于当前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

处理方法和运作流程。^①张思认为中共在根据地推广合作运动时,互助组的记工记账制度“带有村集体性质的村账制度雏形”。^②

民间传统的互助组织一般不计算具体的货币报酬,互助中常以劳动、畜力、实物的形式进行交换或补偿,具有临时性、分散性的特征。^③若有人觉得在互助中吃亏了,就会退出互助关系,或另寻他人,或者“单干”。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农业合作组织从生产到收获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要求互助成员之间的劳动有量化记录,组织内部的财务有账目,粮食收获后按规定的制度进行分配。这对于一般只记“心里账”、而较少记录“文字账”的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一个合格的会计以及与之相应的会计制度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典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经过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几个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计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它是应运动的发展阶段和生产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并逐渐规范化。会计制度形成后,对农业合作社的运营,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山东省为中心,结合政府公文、调查资料和村庄档案,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会计制度的形成展开论述,分析其在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④

一、互助组织中会计制度的萌芽

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存在各种类型的互助组织。在这类组织中,农民一般只记“心里账”,有文字记录的账本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参与的家庭较少,“换工”量不大,都能记清楚;另一方面,相互之间关系较亲密,记账总给人“不被信任”的感觉,抹不开情面,因此大部分农民不记“文字账”。这些条件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的互助组中发生了变化,就产生了记账的需要。

1944年,山东根据地临沭地区,缺乏畜力和劳力的农民组织的搭犊队,有三种形式:临时性搭犊、常年搭犊、大合犊。临时性搭犊是在春耕时,有牛户出牛给无牛户耕地,无牛户以做工为报酬。交换比例不固定,依人情关系和双方临时交涉而定。常年搭犊是两三家牲口联合起来耕种,或者牲畜一起喂养、共同使用。大合犊是在农忙时,土地和劳力差不多的户联合起来,一起干活以提高效率。“过去临沭中农以下的农民,有80%参加了常年的或临时的搭犊,甚至部分富农也参加了。”^⑤类似的组织在各地有很多,名称不同,如“犊”“犊犊”“搭套”“换工”“扎工”等。这些互助组织的成员大多为亲族和近邻,虽然没有“记工”习惯,也没有纸质账本,但是参与的农民心中都有一本账。若认为自己的劳力和畜力在其中得到公平对待,则继续参与互助;若有争议,双方就地协商,或以口头交流的形式解决,极端的结果是农户退出,互助组解散。当然,绝对公平是很难的,因相互关系亲密,即使劳力付出有一定差异也不计较太多,甚至有时双方的付出十分悬殊也并不在意。这种组织体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互帮互助、相扶相持的精神,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令人向往的重要原因。

1943年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号召各根据地在农村地区推广互助合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将原有组织扩大,或多个互助组合并的形式,对其进行升级。各地的互助组数量增长

① 涂玲《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凭证、账簿研究——以侯家营、下孔村文本为中心》“摘要”,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1年。

② 张思《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村账、村会计与乡村社会变迁》,《邯郸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③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7—278页。

④ 本文论述的对象是典型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会计制度的形成状况。所谓典型,即根据政策的引导,先后经历了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集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就全国而言,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始时间、发展速度、推进程度不尽相同。有的从根据地时期开始,有的1949年之后才开始;有的没有经过互助组阶段,甚至没有经过初级社,直接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非典型地区的会计制度形成过程与此不同,需另文撰述。

⑤ 《山东临沭一带的搭犊队》(1944年4月29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很快,1946年山东省的互助组数量比1945年增加50%,共215 918个,占总人数的7%。^①升级后的互助组织比过去的大,“记工”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一方面农户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不记工总有人觉得吃亏,时间长了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涉及的农户多,农户之间劳力、畜力、土地差异增大,打“心里账”较难。记工后,若产生争议也有据可查,可以让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同时,将这种组织规范化不仅利于其发展,也利于共产党整合乡村资源进行抗战事业。这种新成立的互助组一般称之为“变工互助组”。

所谓“变工”就是换工,即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不同劳动投入之间的互换,以达到生产效率提高的目的。因农户之间的劳力、畜力等条件不同,具体运行时形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人工换人工。劳动力之间的互换,你帮我干一天,我也帮你干一天。
2. 人工换畜工。牛主出人、出牛、出草料、饭食自给,耕地一天换三个工,即人、牛、草料各算一个工。
3. 人工换纺织工。莒南大山前变工组鲍大娘以帮牛主纺一斤线、剪两天谷壳换牛主给其耕一亩半春地(妇女算半劳力,与短工市价折合不吃亏)。聂邦本互助组有五户,三家中农帮贫农把线织成布换工,一斤线织成一斤布算一个工。^②
4. 人工换副业工。参加互助组后本人外出运盐或经营副业,耕作由他人照顾,回来后,按地里所需劳动支出工资,成员平分。^③

要使变工互助组有持续的生命力,换工和算账是关键。不同的劳力应折算不同的工,妇女和儿童有的地方只算半劳力,有些弱劳力可折七成,一个忙工抵两个或三个闲工。有的将一个工分成10分,早餐前2分、上午4分、下午4分,并根据勤、惰设立加、退分制度。不同畜力的牛力也区别计算,小牛和驴只算半牛力。草料的工分,根据当地粮价草价及短工市价,按比例进行适当折算。^④有的地方不同质量的驴工分也不同,有的是10分、8分,也有的只有6分。^⑤如果是合买的牲畜,按劳动力记分饲养,或按照土地比例轮流饲养,牛粪按地亩分。^⑥有的地方畜力干一天相当于1.5个工。^⑦

在记工算账的方式上,各地创造了各种方法。莒南地区变工后按时或按件记工,采用竹签的办法,一个工一支竹签,按季节结账。^⑧官地村实行工票制度,以10分为一个工,设立工资标准。“为便于记分,以纸牌制工票,有1分、2分、5分、10分,工票盖着队长的手章,由队长拿着,干完一天的活晚上评过分,马上发工票。”或者将工日按照市价折合成粮食支付,工资由会议讨论决定。^⑨还有的是每

① 《山东省1946年度生产统计资料》,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② 《莒南金岭、金花村劳动互助调查》(1944年5月30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706页。

③ 《莒南金岭、金花村劳动互助调查》(1944年5月30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707页。

④ 《莒南金岭、金花村劳动互助调查》(1944年5月30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709页。

⑤ 《文登富贵村组织互助组的经验》(1948年10月2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809页。

⑥ 《官庄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1944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页。

⑦ 《莒县爱国村农业合作社史》,《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⑧ 《山东莒南变工互助的成绩、种类和经验》(1944年8月21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713页。

⑨ 《官庄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1944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195页。

天晚上回来后,根据个人做得好坏来评定分数。有的用纸牌记账,或用爬齿刻成印子,“上面刻着分数,由小组长揽着,每天记工后即按工分给每人”。^①当时的记工工作一般是互助组组长负责,有的设有记工员,互助组成员的工分在结算日进行结算。工票制度后来发展成为劳动工账,以10分为一个工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底分功能相似,工分账是后来会计账簿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助组时期的“记工算账”是会计制度的雏形。

二、合作化运动与会计制度的逐渐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作化运动快速推进,各地纷纷成立初级社。农民将土地、牲畜、农具等财产折算成股份入社,根据股份和劳力在收获后进行分配。原来的“记工算账”不再能满足实际需要,会计制度因此形成。

与互助组相比,合作社的规模更大,涉及的家庭更多,社会关系复杂;拥有的土地数量和类型更多,需要制定计划,统一经营;关联的财产更多、种类繁杂,财务收支需要有详细记录;社员财产公用,社员预支使得其与合作社产生了财务往来;分配制度更复杂,对数学能力有相当要求;与官方的关系更密切,要配合公粮征收和劳力调配。组织规模的扩大,使得财务管理工作更繁琐,这些工作不能像互助组时期一样,还由社长一人兼任。所以,客观需要将其从合作社的经营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位,由“会计”专人负责。

另外,就农民而言,新成立的互助组和“记工算账”的方式在民间有深厚基础,尚能接受。而合作社要求他们将维系身家性命的财产“拿出来”,做出这个选择需要勇气,他们在做选择时多少有所顾虑和迟疑。要让他们打消疑虑,安心入社,必须合理登记入社的土地和财产,公正对待他们的劳动,公平分配合作社的收入。这都给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设计一套合理、高效的会计制度就很有必要了。

再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会计制度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互助组是私有制,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公有制,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是完全的公有制。后两种制度涉及共有财产,共有财产需要有专人来管理,特别是收入和分配问题,若没有专人负责,容易产生混乱。

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会计问题的重要性。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要建立一些必要的简明易行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在等价和互利问题上,“反对不算账、不等价的方法”,使用合适的计算方法。^②1953年中央再次强调,应“逐步建立必要的、简单易行的,但又是严格的财务和会计制度”。财务开支“其批准权限应按开支数目的大小,分别由社员大会和理事会讨论决定,各种账目必须适当地分别清楚,并要定期公布,以便受到社员的经常监督”。^③

合作社与互助组的会计工作相比,最明显的改进是在记账方式上。在互助组时期,农业收入归各家所有,不需要记账,账本主要是工分账和副业收支账。表1左列是刘所村(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接山镇,在大汶河北岸)互助组为搞运输,购买工具和零件的花费账。记账方式类似于家庭收支流水账,将花费的账目一项一项列出,只简单记录数量和金额。初级社账本1比互助组更详细,列出了每一项费用由谁经手、花在何处。如互助组购买麦子27斤,未说明作何用途,初级社账本1对贷款

^① 《山东滨海区变工互助的经验》(1945年4月3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75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1年12月),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③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221页。

的使用都有注明。初级社账本2与账本1相比又更科学,列明了账目的发生日期,设置了会计项目,载明合作社的收入和支出,一笔一笔逐条登记,是现金流水账。河北省许仙桥合作社的账本中就包含流水账,逐日记载社内支出。^①不过账本2的现金流水账并不完整,还应包括收入和转存,而刘所村的会计在记账时,只将收入项和支出项分开记载。

记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将每一笔账的来龙去脉记清楚,即该账目从哪里来、经谁手、最终到哪里去。而采用哪种记账方法、如何记,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互助组的账本记录虽然不全面,但涉及的家庭少,农业还是个体经营,“集体的事业”一般是副业。因此账目较为简单,只需将收付事项记录在案即可,缺失的内容成员大都能记住。初级社是社员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涉及的账目繁杂,必需采用一套科学的记账方法才能把社内的账目记录清楚。从表1互助组和初级社的三列账目可以看出,记账方式越来越科学,账目时间更详细,账目用途更清晰,并设置了会计项目。账本1和账本2都是1955年的,而记账方式不同。可能的情况是账本1是旧式记账法,而账本2是学习新式记账方法后对账本1的改进和整理。

表1 刘所村互助组、初级社的会计账目对比

互助组(1954)		初级社账本1(1955)			初级社账本2(1955)			
4月14日		日记花费账			日期	项目	明细	支出
大肚一根	24 000			金额	3月16日		换口头明如的牛找钱 10元	10
拖皮三拖	19 000	拉炭	来洋	30.12	3月14日	农业支出	买豆饼一片	1.29
工线	5 000	德杯的卖牛款	来洋	30	3月15日	农业支出	搞车油12两	3.6
小鞭头	5 000	德金买牛添钱		11	3月17日	农业支出	结小鞭买鞭稍	0.35
4月18日		德金德榜德金三人的 牛卖出	来洋	40.17		管理费	洋油半斤	0.2
套两根	18 000	德榜买牛添钱	来洋	1		社员往来	收入订购棉花	8
皮条	17 000	信用社贷牛草款	洋	20	3月18日	贷款	信用社贷款买花生种	7
蔴	6 400	收入订购棉花洋		8	3月21日	项目	摘要	收入
麦□27斤	4 600	收入贷花生种款	来洋	7	3月27日	社员往来	德金投来牛一股三人 伙牛	16.7
以上共洋 99 000, 9 人摊,每人 11 000 元		收入银行贷款	洋	130		社员往来	玉才投入种子草料 粪肥	62.93
		收入卖麦子	洋	4.88	四月初九	副业收入	社内公积粪肥 106 车	9

资料来源《互助组花费账》(1953年—1954年12月),《五五年八户小社日记账、小社牲畜农具账》,《五五年八户小社花费账、小社工分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藏《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4-1-1.4-2-1.4-2-4。该档案所藏地以下不再逐一标注。

说明:互助组的账本是在空白纸上一条一条记录,初级社账本1和账本2都是手绘表格填写。互助组账本金额单位为旧币。

由于合作社的规模比互助组大,互助组只有工分账和副业账,合作社多了日记账和分类账,以及其他账本。从《刘所村村庄档案》保存的账本来看,1955年初级社的账本有日记账、工分账、牲畜农具账、耕肥账、草料账、种子账、预分方案及分粮食账、花费账、单据账、棉花账、决分方案及明细表。这些账本有的是从日记账中分出来的,有的是单独建立的。为了看出合作社各项事业的收支情况,在账本内设计了很多会计科目,共有固定财产、库存物资、预付款项、银行贷款、公积金、公益金、社员往来、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农业支出、副业支出、杂项支出、生产资金十三种。^②这些账簿在传统农村是不存在的,是政府推广的结果。许仙桥的农民说“新式账比旧式账好的多,新式账好记、账好总

^① 《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制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编(1949—1952)》(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页。

^② 《五五年八户东平学习试习新账》,《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4-4-6。

结,一笔一小结。”^①这些账本和会计科目的设置,明显受到政府对会计培训和学习的影响。四川简阳县射洪乡的合作社会计,在记账时对会计科目的处理存在许多错误。劳动竞赛所用的红旗属于行政费用,却“放在农业投资的科目里”,“又把耕畜饲养费、喂猪饲料等放在‘行政费用’里”。县委在组织会计培训时,就将会计科目的学习作为重点。^②

从初级社的账本看,其对合作社生产经营的账本记录很详细,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建立的账簿较分散和随意,不成体系。耕肥账和种子账同属于农业支出,花费账应包括在日记账内,但全部单独列出。账本2中有的没有设置会计项目,没有财务开支计划,工分账上把所有人的工分记录在一个账本上。鉴于初级社只有8户家庭,尽管有很多类似的小问题,对经营的影响也不大。至于财务管理、财务公示和监督,没有留下文字材料。由于合作社还较小,很可能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因为账目还较简单,涉及家庭少,财务数据不多,社员对社内的财务状况应较为熟悉。如果合作社继续扩大,这样的记账方法会带来很多问题,有必要对其规范化。

三、农业合作社会计制度的规范化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合作社规模扩大,账目更复杂,财务管理工作亦变得繁冗,原来简单、不完善的会计制度又不敷现实需要,因此需将其规范化。中央要求各地合作社“必须建立一套简单易行的必要的财务会计制度,以监督与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计划的执行”。^③中国传统的财会管理是四柱结算法,而合作社采用的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新式会计制度。^④1955年农业部根据各地的经验,编定了农业合作社的会计教材,^⑤山东省以农业部的教材为基础编制了适应地情的教材,^⑥供各地的干部学习。我们现在见到的合作社会计教材,绝大部分是1955年之后才出版的。1956年刘所村将三个小初级社合并,成立一个大初级社,共126户,基本涵盖了所有家庭,其会计制度基本按照教材来运行。

(一) 账簿体系的建立

账簿体系是财务管理的基础,是会计制度规范化的重要标志。通过账簿体系可以观察合作社人、财、物的流动,是社内最大的“秘密”。现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档案,也以各类账簿居多。《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会计账簿占了总量的七成以上。

合作社的账簿,第一类是财务账,分为日记账和分类账两种,数量最多。日记账是按照收付事项发生的先后顺序逐笔记载的账簿,如社员投入的物品、现款,银行贷款、购买农具、农药、化肥以及出卖产品等收入事项。日记账内有以下内容:时间、单据编号、会计科目、摘要、分页、转账(收入、付出)、现金(收入、付出、余额)。合作社应以记账和管理方便为指归,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适合的会计科目。不同的合作社会计科目可能略有差异,大致可分为四类:资产类(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存款、预

^① 《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制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编(1949—1952)》(上),第132页。

^②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射洪乡工作组《简阳县射洪乡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1955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9—1110页。

^③ 《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1953年5月30日),《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

^④ 关于中国传统会计方法及其近代转型的研究,参见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魏文享《上海与会与1930年代改良中式簿记运动》,《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魏文享《晚清江南制造总局的财务奏销与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刘秋根、郭兆斌《清代前期龙门账簿记报告编制方法研究——以晋商年终结算清单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王祥伟《四柱结算法登载外欠账的方式及其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⑤ 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编《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教材(中级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5-2(G1)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⑥ 山东省农业厅编《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暂用会计教材》,1956年印行,《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9-5-1。

付款项),负债类(股份基金、公积金、公益金、贷款),往来账(社员往来、社外往来),生产结算类(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农业支出、副业支出、收入分配、管理费、杂项收支)。设置会计科目的目的是为了登记分类账,即按照收入、开支性质分类记载各种收付事项的账簿,每一个会计科目对应一种分类账。因为日记账过于繁杂,要检查某一类账的具体情况不方便。将日记账上的收付事项进行分类,记载在不同的账本(分类账)上,可以看出整个经营中资产、负债的变化情况。刘所村的财务账有:日记账、经营收支明细账、社员往来账、明细分类账、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社员往来账、社外往来账等。分类账是合作社账簿体系合理化的重要标志,1952年许仙桥社的财务账就没有分类账,不同项目的收支记在一起,^①这对大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不便。

第二类是备查登记簿,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账簿。有些必须记载的事情财务账包括不了,或者有些收付事项暂时不能记入财务账,这就需要建立各种登记簿加以登记。一般有六种:固定资产登记簿(登记社内的各种财产)、库存物资登记簿(登记社内各种材料、原料、农业和副业产品)、土地股金登记簿(登记社员入社的土地和交纳的股份基金)、租入牲畜工具登记簿(登记社里租进的牲畜、农具、车辆和副业生产工具)、产品登记簿(社里收获的产品如暂时不便作价记入财务账)、预分登记簿(收获的产品预分给社员时,如暂时不便作价登入财务账)。刘所村的备查登记簿有:财产物资登记簿、产品登记簿、夏秋预分登记簿、库存物资登记簿、低值易耗品登记簿、土地股金登记簿、土地劳力变动登记表。

第三类是劳动工账,记载社员参加社内劳动所得的工分数。工分账是劳动报酬的分配依据,是社员最关心的账簿。每个人的劳动工分登记在各家的劳动手册上,由记分员登记,以队长盖章为证明。劳动工账是会计在记分员和队长的协助下,根据劳动手册整理而成的。

合作社的初期,各地的账簿形制不一。有的甚至是手绘的,相当零散。而此后的账簿都是由省政府统一印刷,簿内栏目、账簿种类和大小全部统一。刘所村在1956年之后,都是使用统一印制的账簿。农民对新式账簿评价很高,许仙桥的农民说:新式账“那时看那时明白全社收入和支出情况,旧式账不到结账时明白不了”。^②

(二) 记账方式的改进

这时的合作社一般采用复式记账法。记账时,所有的收付事项都以人民币为单位,实物的收付也要折算成现金。有一个统一的记账单位,才可以进行加、减、分、合的计算。如农民入社时投入的牲畜、农具、种子、肥料、现金,若只记载数量而不折算成人民币,合作社的收支很难核算。农作物种类多,不折算成现金,分配工作更是无法进行。

凡是现金的收入应区别收入和支出,记入日记账。不是现金的收付事项,为了反映收付的全面情况,要做转账收付登记。如社员投入价值10元的种子,一方面是社员投资增加了10元,这笔账结算时要归还,另一方面是农业支出增加了10元,所以分别记载。前者记在收入项,后者记在支出项,收入和支出相等即平账。记完日记账后,还要将这两笔账记入分类账——社员往来账、农业支出账,方便查阅和结算。这类没有动用现金的转账收付,也看作现金来记账,即前面所说的核算单位统一。现金收付只记一笔账,是由于账目的单位都是人民币,日记账上现金的余额可以看作库存的现金。

如果一笔账包括现金和转账收付两部分,应将现金账记入日记账,转账收付再记两笔账。如向供销社购买水车,价值50元,付现款10元,欠款40元。日记账内的现金栏记农业支出10元,转账收付记社外往来—供销社(收)40元、农业支出40元,暂欠的40元再记入社外往来账,农业支出亦记入

^① 《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制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编(1949—1952)》(上),第132页。

^② 《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制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编(1949—1952)》(上),第133页。

分类账,这样就做到了现金收付和转账收付的账目平衡。这种复式记账法将每一笔账的来源和去处展示得很清楚,亦能看出合作社的收支情况,较为科学。

备查登记簿和劳动工账的记账则较为简单,只需记好时间、摘要、数量、金额,在月计和年终结算时再进行检查和核算就可以了。

(三) 财务管理的规范

1. 财务计划。会计应根据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编制年度收支和分配计划、基本建设收支计划、季度现金收支计划。好的财务计划便于统一筹划全社的生产资金,并将其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资金不足或浪费。还能让社员对社内资金来源和用途心中有数,也能让社员估算出自己完成计划后,能得多少收入,提高劳动积极性。1956年刘所村制定了很多财务计划,主要有基建计划表、财务计划、包工计划草案、包工计划表、作物定工表、冬季生产计划、统购入库合同、加工籽棉合同。^①

2. 开支审批。合作社应该召开社员大会,对社内开支规定条件,如小宗开支需经社长同意,追加预算需经过社委会或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刘所村的社章规定“保管员保管不管花,要花一元至三元,社长有权开支。三元至五元,经过社务委员。十元至二十元,经过全体社员讨论。二十元至五十元,报请乡人民政府批准。”^②对开支进行审批可以限制乱开支和花钱不当的事情发生。

3. 社员预支。因社员的大部分财产都已经入社,平时基本没有收入,为应付不时之需可以向合作社预支粮食或钱款,为此需制定相应的原则和标准。标准应适当,若太低会导致预支过多,影响年终决算。所谓的“超支户”和“倒挂户”就是因为预支过多,在年终决算时,应得的钱粮不够弥补预支的数额造成的。社员超支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普遍现象。

4. 单据。又称会计凭证,农民常称之为条子,是记账的根据,是财务管理规范的重要标志。只有做到收付事项有证据,才能更好地健全收支手续,完成审批制度,防止乱花钱、随便领东西等现象的发生。单据有的是社外开的,如向银行贷款。也有的是社内自己开的,如库存的肥料。有时市场上零星购买的东西没有单据,也要由经手人补写单据,才能记账。每项单据都要经手人盖章才算有效,每个单据都应编写号码,方便查账。如果单据填写错误,也应注明作废。所有单据要按照时间顺序,装订成册。《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保存的单据,都按每月一册、每年一捆的形式存档。

5. 财务公示。为了保证账目的记载正确无误,应在每月末对账簿和物资进行检查,将错账查出并更正。更正错误时不能直接涂改,应采用直接改正法、红字冲正法或补充登记法更正。每月结算之后将账目公示,应包括四项内容:社内财产的保管、各项收支、往来及负债、劳动工分。年终决算后建立的新账也应进行公示。《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保留了1956年全年月计表,决分后的资产负债表。^③财务公开对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有重要作用,许仙桥社建立了“黑板账制度公示账目”,农民许宗荣说“今年账目这样公开,俺哥俩心里明亮,干活就上劲了”。^④

上文所述仅是初级社的内容,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会计工作与此相似,只是社员更多,财产种类和收支类型更多,会计原则和原理是一样的。

四、会计制度与农业合作社的关系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会计人才缺乏的问题。首先,大部分农民没有对农业生产进行记账的习惯,新式记账方法对会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一般农民的受教育程

① 《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9-3.9-4。

② 《第十农业社社章(草案)》(1953年),《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5-3-1。

③ 《五六年全年月计表》《五六年齐村、刘所资产负债表》,《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9-2-1.9-3-1。

④ 《1991-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制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编(1949—1952)》(上),第134页。

度较低,文化水平相对高的地主和富农在初期不允许入组入社。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会计人才越来越紧缺。如果会计工作做得好,账目清楚有条理,并按期公布,社员对社内的账目心中有数,没有顾虑,能够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如果会计工作搞得不好,社内家底不清、公私不分、开支混乱,就会影响社员的生产情绪,合作社就有垮台的危险。总之,有一个好的会计和一套好的会计制度是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会计问题是很多合作社解散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也说“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①

1945年,山东博兴县三里庄成立了农业合作社,由于经营不善,财务和账目管理混乱,加上干部矛盾、干群矛盾,仅半年就解散了。^②东平县有的互助组“算账找粮等不合理,甚至有的不记工、不算账找粮,有的沾光、有的吃亏”,因此很快解散。^③有的合作社会计不负责任,账目不清,一年未清工结账,社员不满,纷纷退社。^④文登地区的合作社,“财务制度不严,开支手续紊乱。有的不会记账,有的账目不公开,有的将账记错。这些混乱现象引起社员不满。姜立云社,漏账、错账、开支没单据”。^⑤合作社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并非山东省独有,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黑龙江拉林县试办合作社后,从县里派了两个干部蹲点,但账目依然混乱。在该地负责办社的150多个县区干部,熟悉会计工作的只有16个,70%以上一窍不通。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县委制定了会计培训计划。^⑥有的合作社会计问题突出,都是糊涂账。“1954年的收入到1955年4月才结清算完,引起社员极大的不满”,在社员会议上曾多次质问干部说“到底还分不分给我们,把账报来听一听呀!”^⑦农民对会计问题也特别关心,陵川县的农民说“没有会计人才,弄不清账目,社还是个垮台”。^⑧许仙桥社开办时会计制度搞不好导致4户退社,社员都说“想达到团结生产,必须搞好会计制度”。^⑨

为了让合作化运动顺利开展,迫切需要解决会计人才问题,各级政府和合作社组织了各类学习班、培训班。1953年东平县训练了合作社干部1160人,除了政治学习外,经营和财务管理亦是重要内容。^⑩1954年山东省要求各地县政府开办专门的会计训练班,保证每社训练一人。^⑪1954年东平县开展第二期训练班,有765人参加,成员有村支书、社长、会计等。^⑫还计划在1955—1958年训练合作社干部和会计4500人。^⑬曲阜县由于会计人才缺乏影响了互助组升社,不得不将计划办社数压缩一半,群众说“互助组办得再好,没有会记账的人也不能转社”。1954年12月,该县成立了青年

① 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95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451页。

② 《一个只坚持了半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45年),《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续编)》,第767页。

③ 《东平县委委员会全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总结报告》(1952年11月8日),东平县档案馆藏,档号2-27-5。

④ 《东平县委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总结》(1953年12月),东平县档案馆藏,档号2-37-15。

⑤ 《中共农村工作部批转文登地委关于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点检查报告》(1953年6月17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169页。

⑥ 中共拉林县委员会《关于财务管理》(195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391—397页。

⑦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射洪乡工作组《简阳县射洪乡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1955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第1106页。

⑧ 张王成《陵川县培养会计的经验》(195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202页。

⑨ 《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制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资料汇编(1949—1952)》(上),第133—134页。

⑩ 《东平县互助合作训练班工作总结》(1953年2月2日),东平县档案馆藏,档号2-37-5。

⑪ 《中国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动机训练互助合作的区乡干部和办社骨干的通知》(1954年11月17日),《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⑫ 《中共东平县委第二期互助合作训练班总结报告》(1954年12月2日),东平县档案馆藏,档号2-55-7。

⑬ 《中共东平县委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农业互助合作发展规划草案与当前工作安排的报告》(1955年9月4日),东平县档案馆藏,档号2-79-10。

会计学习班,学习内容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训练教材》为主,此外还有各种登记表、会计科目、簿记格式、记账方法、预分和结算分配,培养了24个会计。^①陵川县建立了速成会计班,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学认工单、会计账簿、记账方法、珠算,时长为四个月。^②辽宁彰武县第三区委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在1955年春季会计会议上提出建立三合会计互助网(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有24个农业社的会计参加了互助学习网,“对于提高会计员的业务水平,搞清账目,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起了极大的作用。^③

虽然对会计进行了培训,但很多人在刚担任这个职务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工作。寺北柴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会计刚开始任职时,很多东西都不清楚,第一年的账目还是别人帮他做的。^④辽宁彰武县农业社的会计,“虽然都在县训练班学习过,仍旧有些会计不能胜任工作。有的怕沾包,有的怕做不好,有的不想当会计”。^⑤北京地区的合作社劳动工分制度和财务会计工作还存在很大问题,“绝非一两次整顿就能彻底解决,需要不断整顿”。^⑥有些地方的会计业务能力差,经过很长时间才解决。直至20世纪60年代,陕西丹凤县还在对会计进行知识培训,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的工作与任务、财产账户、账簿、固定资产、记账方法、劳动工分核算、分配办法、财务计划、财务制度等。^⑦

会计对合作社的生产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会计应严格掌握执行各项财务制度,社内开支、社员预支、物资保管使用都要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对不合制度、不合手续的开支,要坚持原则,不能随便报账。编制的财务计划要精打细算,合理运用资金,防止盲目投资和滥开支的现象。应和其他干部一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生产和财务计划,增加收入。如果盲目投资,盲目建设,摊子铺得太大,会导致集体负债多,生产虽有增加,但成本过高,社员收入反而下降。^⑧1953年吕鸿宾社(位于山东省莒县阎庄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使得每户负债103元。^⑨四川简阳县的合作社,1955年度有“九个社的农业和副业生产投资,都超过了总收入的25%,有六个社达到30%以上。加上扩大再生产投资,则九个社的总投资额达到了总收入额的36.2%”。虽然总收入增加,但投资额过大,影响了农民生活。有人反映说“我们合作社是除了锅巴没有饭。”^⑩投资过多虽主要是经营管理问题,但会计也负有相当责任。制定好财务计划和成本核算是会计的本职工作。合作社负债过高,容易造成资金流的紧张,对长期发展很不利。生产计划混乱、收支无序是中央政府在1953年对合作社的冒进、急躁倾向进行纠偏的重要原因,随后提出“勤俭办社”的方针。^⑪

会计还深度参与合作社的分配工作。分配是合作社的大事,也是会计最重要的工作。社员对分

① 《曲阜县第八区保安乡青年团支部建立青年会计学习班的经验》(1955年4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513—516页。

② 张王成《陵川县培养会计的经验》(195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202页。

③ 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95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452页。

④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页。

⑤ 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95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452页。

⑥ 《北京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10月),《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305页。

⑦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花岭大队表格》,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12—128页。

⑧ 《中共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指示》(1953年10月4日),《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60页。

⑨ 《莒县爱国村农业合作史》,《山东省农业合作社史》编辑室编《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下),第377页。

⑩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射洪乡工作组《简阳县射洪乡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1955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第1104页。

⑪ 《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1956年7月3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183、542页。

配也最为关心。收入分配工作做得好,使公共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合作社有一套完整的分配制度,全年的分配分为三次:夏季预分、秋季预分、年终决分。预分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预分与实际应得的差额在年终决分时找补。夏季预分的程序可分为八个步骤:成立分配委员会、估工估产、结清全社财务账、清理社员劳动工账、制定预分方案、编制分配明细表、整理农业税、粮食分配。秋季预分和年终决分的程序与夏季类似,需注意的是工分结算(补贴工、烈军属代耕工、基建工、转下年工),留存公积金和公益金,处理好贷款和利息收入问题,并留存部分钱粮以供下次收入前的开支。三次分配中的所有程序都离不开会计的参与,如果会计业务能力不足,分配工作很难进行。《刘所村村庄档案》中保存有合作社的夏季预分明细表、秋季预分明细表、预分登记簿、收支概算表、决分明细表、决分后社员找补明细表。^①

会计应协助出纳、保管人员做好社内财产物资的保管工作,防止财产流失。有些合作社做得并不好。1956年刘所初级社年终总结时就提到农具管理问题,“我社的农具管理不强,社员随便随掉,无人招管,弄的东一件西一件,破烂损坏,寻找没处。至于大车放在外边雨淋,无人收搁,以致损坏小东西。在秋耕时候拖车耕套撒乱满街,到明年下坡,不是少这就是少那。至□扒扫帚口袋等,年终清点少数三十余件”。^②

由于会计和财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特征,普通村民翻开账簿,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数字,而对数字背后的秘密却难以知晓。虽然合作社社章都有社员监督干部、检查社内财务状况的内容,但财务的特殊属性使得社员的监督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如转账收付的账目,一般农民看不懂。这给村干部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这可能也是政府对合作社进行多次整顿,发动政治运动来打击基层贪腐行为的原因之一吧。1955年东平县对合作社的整顿措施中,收益分配和生产排在第一位。^③ 会计账簿给会计和乡村干部贪污钱粮、以公谋私提供了机会,有的合作社甚至造假账。20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前期内容分别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每一项都和财务相关。会计作为对社内财产最清楚的人,如果合作社存在这类问题,那他们对这些行为多少是了解的。作为会计,管理好合作社的财务是其本职工作,从四清运动的材料来看,有些会计或中饱私囊或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会计掌管全社的财务,有时也利用账本保护农民的利益。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国家对农村的余粮征购量增多。为了多留粮食,很多地方发生“瞒产私分”之事,瞒产行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很严重。此外,还有“压产”“限产”“套指标”等行为。^④ 为了不被暴露,合作社需要做两本账,一真一假,前者社内使用、后者应付检查。要使假账经得起检查,需要对会计科目和账本内数字的逻辑关系有足够的理解,做到收支相抵和平账。这项工作非会计莫属。农村地区的这些“小动作”上级并非不知情,但派人调查后经常徒劳无功,只能“光棍瞪大眼”。^⑤

各地在开办会计培训班时,也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山东莒南县的高家柳沟村在建立合作社时,工分只能用画圈、画杠的方式记,甚至连人名、农活的名称都不会写。合作社以四个高小毕业生任教员,开办会计训练班,组织青年从识字开始学习。首先学写人名、数字和记账格式,后来又学农活名字、地名,牲畜和农具名称。115个青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学会了240多个字,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个能记自己的劳动工账。有的人后来还学习识字课本,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各地开办的会计培训班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对普及农业知识、农业科技也有很大帮助。毛泽东看到莒南县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后,大为赞赏,认为应该普遍推行。“因记工的需要,学习

① 《夏秋预分登记簿》《五六年社员夏季预分明细表》《五六年社员秋季预分明细表》《五六年决分社员工分明细表、现金明细表》《五六年决分后社员找补粮、分麦穗以实物支付明细表》,《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7-2-1.8-7-1.8-7-2.8-7-3.8-7-4。

② 《五六年生产总结》(1956年12月28日),《刘所村村庄档案》,档号6-3-8。

③ 《中共东平县委关于扩社建社的初步总结及今后整顿巩固合作社的意见》(1955年10月27日),东平县档案馆藏,档号2-79-15。

④ 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81-121、171-199、245-296页。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⑤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只是第一步,还要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要求各地编订教材,多办学习班。“各级青年团组织应该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要予以支持。”因会计人才缺乏而开办的学习班,对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当时扫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副社长吴长桂说“成立了合作社,文化水平也提高得快了。”王守敬的父亲看见儿子当上了记账员,欢喜地说“咱也算睁开眼了,以后你好好的学习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买。”^①

五、结语

中共党史的历史演进脉络中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干预和行政力量介入程度深,依靠政治运动来推进革命的进程,改进社会治理方法。传统的党史研究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新革命史”的理论来研究中共革命史,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和曲折。在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是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将革命拉回历史现场。^②“技术性”手段将政策与实践勾连在一起,是从革命到实践的传导机制,对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有重要作用。如土改中的“诉苦”、白区的“革命夫妻”、抗战中的弹药补给,^③都是革命实践中的技术手段。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过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效果”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基层实践的复杂性,如对农民心态和闹社退社问题的关注。^④会计制度是农业合作社的核心制度,是合作运动中重要的技术性手段。从“技术性介入”的角度对合作化运动进行研究,可以观察农村社会与政治运动、国家体制是如何衔接在一起,这对理解合作化运动在基层如何推进,理解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如何嵌入农村有重要作用。

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态,把他们从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转向集体经营。两者的转换是艰难的,数目字管理的会计制度像润滑剂一样将二者衔接起来,是将农民纳入国家战略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向集体化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先后经历了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计从无到有。会计制度应时之需,从账簿体系、记账方法、财务管理三个方面不断改进,逐渐规范化。会计制度的形成提高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农业生产,对集体经济的稳定运行起了重要作用。

合作化运动的初期会计人才缺乏,政府通过编制教材,开办培训班、学习班的方式加以解决。农民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三合互助网,组建学习小组,提高了会计的业务能力。各地在实践会计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促进了会计制度的改进,会计制度的运行也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①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195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509—512页。

^② “新革命史”概念阐述最详细的是李金铤《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其他代表性学者和成果参见董丽敏《从延安到共和》,《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李里峰《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旧与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李里峰《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应星《交界·交叉·交融——浅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革命史”中的结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专项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③ 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李里《“革命夫妻”:中共白区机关家庭化中的党员角色探析(1927—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齐小林《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这些研究虽未在文中明确新革命史的旨趣,但与新革命史的理念是一致的。

^④ 代表性论文参见易棉阳、罗拥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行为: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常明明《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农民心态与行为研究——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李里峰《集体化时代的农民意愿表达与党的农村政策调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满永《难以适应的集体化——皖西北农业合作化中的“闹、退社”问题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

Number Management: The Formation of Accounting System in the Movemen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Guo Zhiwei

Abstract: The technical skill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CP's revolution from policy to practice, which plays a major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transformed farmers from individual economy to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CCP used digital management to connect the two together, and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the cooperatives was born. In order to run the movement smoothly, the government solved the shortage of accounting talents by compiling textbooks and organizing training courses. In practice, the ledger system, accounting method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make the system more standardized and inject energ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The special attributes of accounting work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of cooperatives, the lives of farmers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ccounting System

(责任编辑:高超群)

《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的经济史价值

记得2018年夏天笔者参观河北省饶阳县耿长锁纪念馆时,对于耿长锁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印象非常深刻,只是当时所得到的资料非常有限,这对于我出生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遗憾。而杨学新、刘百恒、樊孝东诸先生编著的《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已于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集体化时期耿长锁及五公村社会经济历史,是非常难得的史料。

在我国农业集体化历史上,耿长锁领导的五公村颇具典型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耿长锁就组织了五公村“土地合伙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被誉为“花开第一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耿长锁作为领头人的五公村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当时有“社会主义之花”的美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耿长锁及五公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对而言,国外学者研究耿长锁及五公村的成果影响比较大,如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C. Pickowicz)和赛尔登(Mark Selden)三人,从1978年开始先后十余次前往五公村进行实地调研采访,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国际影响非常大。历史学家杨学新等学者认识到耿长锁及五公村口述资料搜集与整理严重滞后,如果不抓紧抢救,随时会有消失的可能,他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学者的学术使命感使他们将耿长锁与五公村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重点考察基点,利用寒暑假及其他休息日与研究团队到饶阳县特别是五公村进行深入调研工作,访问当年的亲历者尤其耿长锁的后人和同事,搜集有关档案与文献,并出版了《冀中花开第一枝》——耿长锁与五公村珍贵历史影像》(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而这部《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则是鲜活的文字记录。在口述采访与整理过程中,编著者秉承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注重真实性,保持原生态;力图点与面结合,既重点突出耿长锁在集体化时期的典型性、旗帜性与引领性,同时兼顾五公村其他成员的作用。

该口述史除了耿长锁的口述之外,还有经过整理的37篇口述。口述者中年长者90高龄,年少者也年近花甲,包括了五公村不同村民。应该说,这是一部学术含量非常高的口述史,保存了集体化时期大量珍贵经济史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魏明孔)